

马桥文化的去向

宋 建

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1993·济南）

第二辑

- 20 马桥文化的去向（宋建）
- 21 论苏北淮海地区青莲岗文化的性质（燕生东）
- 22 淮河流域的侯家寨文化（阚绪杭）
- 23 石家河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外力作用问题（王红星）
- 24 贵州新石器与新石器时代（宋先世）
- 25 南岭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关系（贺刚）
- 26 综论华南史前印纹白陶遗存（任式楠）
- 27 粤东、闽南史前文化区域<提要>（曾骐、林锐）
- 28 粤闽台沿海的彩陶及相关问题（吴春明）
- 29 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考古研究的实践与思考（李岩、赵善德）
- 30 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制陶工艺的实验研究（李文杰）
- 31 诸“亳”及其性质的考古学研究（田建文）
- 32 商文化大辛庄类型初论<缩印稿>（徐基）
- 33 田齐王陵初探（罗勋章）
- 34 齐国故城陶窑遗址的初步调查（张龙海）
- 35 山东地区东周青铜器研究（刘彬徽）
- 36 渭水流域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研究（刘军社）
- 37 山东汉代墓葬出土陶器的初步研究（杨爱国、郑同修）
- 38 西汉长沙王室墓发掘概述（宋少华、李鄂权）
- 39 关于“察吾呼文化”<论文提要>（王明哲）

1970年代之前，学术界一般将环太湖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归之于湖熟文化，或者笼统叫“印纹陶文化”。(1)1978年召开的“南方印纹陶讨论会”上，学术界取得共识，分区研究以印纹陶为特征的南方古文化，将宁镇地区(包括皖南地区)与太湖地区(包括杭州湾地区)分开(2)。环太湖地区的夏商时期文化特征鲜明，以上海市的马桥遗址第四层最为典型，命名为马桥文化。关于马桥文化的特征、分布、年代、来源等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3)。

关于马桥文化的去向，现已发表的论文，大致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方面是直接论及马桥文化的去向。李伯谦先生在《马桥文化的源流》一文中，认为上海的寺前遗址中层，无锡华利湾墓葬等西周早期遗存，在年代上已与马桥文化基本衔接，即应该为马桥文化的去向，但是它们的文化面貌同马桥文化明显有别，因此“这类遗存的性质已不再是马桥文化，而是属于宁镇地区同期文化的范畴了”。但是，环太湖地区仍然特色鲜明，“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特点的和宁镇地区不同的吴文化新类型”(4)。另一个方面是对环太湖地区的夏商周文化进行分期研究，黄宣佩、孙维昌先生分了三期，第一期即为马桥文化，第二期的年代定为西周，也以寺前中层和青浦骆驼墩等遗存为代表。认为第二期的印纹陶等演变为与镇江等地具有共同的特征，反映了吴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到达了上海地区。(5)本文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进行深入一层的分析。

根据现在积累的考古发掘、调查资料，环太湖地区与马桥文化去向有关的文化遗存存在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经正式发掘后发现的直接迭压在马桥文化之上的遗存。上海马桥遗址的第四层为马桥文化，第三层，报告定为春秋战国时代。这二层之间的年代缺环太大，因此马桥第三层不可能是马桥文化直接的去向。上海金山县亭林遗址，已经发掘多次。根据70年代的发掘，第四层是马桥文化，第三层的主要遗存有灰陶三足盘、细高柄豆、绳纹、折线纹、回纹、梯格纹等，年代大体为西周时期，上海学者将其列为紧接马桥文化之后的亭林类型。亭林类型是我们探讨马桥文化去向的重要资料。

第二种是在调查与发掘中所发现的一部分与马桥文化相混杂的

遗存。江苏吴县郭新河遗址为调查资料，其中有属于马桥文化的，如压印云雷纹的陶觚等。另外还有三足盘、束腰壶和刻槽盆等。浙江肖山蜀山遗址1980年发掘，发掘报告待发表。发掘者林华东先生在《对湖熟文化正名、分期及其他》一文中，披露了一部分资料。(6)其中，有少量马桥文化的遗物，如鸭形壶、饰鱼鸟纹的陶觚与陶鬲的袋足等。但是，大部分遗物要晚于马桥文化，有些器形与“亭林类型”相似，其中有束腰壶、带羊角把手的鼎和壶、细柄豆、三足盘、刻槽盆等，还有梯格纹。

第三种是经过发掘，发现了比较单纯的晚于马桥文化的遗存，但是与马桥文化没有直接的地层关系。江苏常熟钱底巷遗址，1987年发掘，发掘报告即将发表。该遗址Ⅲ区T604第三、第四层，即为此类遗存。上海寺前遗址，1966年与1990年先后发掘两次，发现的此类遗存比钱底巷遗址的分布面积更大，内涵更丰富。

上述三种情况，除去马桥遗址第三层，其余都与马桥文化的直接去向相关。对此类遗存，虽然过去曾经提出过“亭林类型”的名称，但是由于亭林遗址的资料至今未予全面公布，而且据我所知，亭林遗址的相关内涵并不是很丰富，因此这个名称的使用不很普遍。本文在下面的叙述中，暂且使用“后马桥文化”这个名称。将来如有更好的名称，即可取而代之。

后马桥文化的陶器分为六系：泥质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红陶、泥质黑陶、硬陶和原始瓷。根据钱底巷遗址出土陶片的统计，泥质灰陶占38%，夹砂红陶占29%，泥质红陶占22.2%，泥质黑陶占2.8%，硬陶占7.2%，原始瓷占0.8%。

陶器纹饰从制作方法上分，有拍印、压印和刻划等。纹样种类有绳纹、梯格纹、席纹、叶脉纹、方格纹、折线纹、云雷纹、圆圈纹、圆点纹、三角纹以及弦纹等。绳纹多饰于夹砂红陶上，以陶鬲为大宗，一般在上部饰横绳纹，下部饰竖或斜绳纹。一些泥质灰陶与泥质红陶上也饰绳纹，但所占比例远少于夹砂红陶。梯格纹等几何形纹样，主要饰于泥质红陶和硬陶上。梯格纹数量较多，纹样单元有细微差别，线条有的较粗，有的较细。一些梯格纹拍印紊乱，有重迭现象。席纹数量也比较多，仅次于梯格纹，单元结构可

分为菱形与方形两类，前者线条比较细密，后者则比较粗疏。折线纹，由多道平行的曲折线条组成，折角有小于90度，也有大于90度的。云雷纹，纹样呈菱形结构者一般比较规则，还有一些变化丰富，结构却不太规则。云雷纹拍印常有重迭，比较杂乱。叶脉纹，拍印者，单元常常相互重迭；刻划叶脉纹，多为单排，围绕器物一周。圆圈纹与圆点纹，是有规则的压印（戳印），一般不会发生重迭现象，表现形式为单排横向排列或者多排平行横向排列，后者还以多道弦纹加以分隔。三角纹，以多道平行线条刻划而成。另外，也有将不同制法，不同纹饰集合于一器之上的组合纹样，如压印的圆圈纹与拍印的折线纹；刻划的叶脉纹和拍印的云雷纹；压印的圆圈纹和刻划三角纹。除了平面的各种纹样外，其它装饰形式还有采用贴塑技法，微微凸起的扉棱和小圆饼等。

陶器种类丰富，有炊器、盛器、食器，下面择主要者勾划其形制特征。

甗 数量很多，均为甗、甗合体形。口沿形制多样，有斜折沿、平折沿、剖面为T形口沿、外翻沿和束颈外翻沿等。器身可分二种形式，一种是甗腹径略大于甗腹径，另一种是甗腹径明显大于甗腹径。不同的口沿与腹径比率的差别基本对应：折沿者与前一种腹径比率对应；T形沿、翻沿者与后一种腹径比率对应。器内有的在隔部还有几个凸纽，以承箅。钱塘江以南的肖山蜀山遗址出土陶甗一侧附羊角形把手，甗腹开有注水口，与钱塘江以北的甗略有不同。

鼎 数量略少，器腹一般不太深，敛口或直口，凸圆底，附羊把手或双耳，把手为上翘羊角形，耳为扁环形贴耳，器足断面为圆形或椭圆形。钱塘江南北，陶鼎形制相近。

三足盘，泥质灰陶，皆为素面，浅腹盘形，口沿平齐，圆弧腹或折腹，高足。器足位置与形制有变化，常见两种，一种是三足内聚，足间距小于口径，断面近椭圆形，但一侧稍微内凹；另一种是外撇足，足间距基本等于口径，断面为椭圆形或圆形。

簋 多为泥质灰陶，深腹，高圈足，沿部可分平沿方唇与翻沿尖唇。器腹是主要装饰部位，母题为压印圆点纹或圆圈纹，平行多

排，有的在圆点纹之间加施堆贴的小圆饼。

豆 泥质灰陶，浅盘形，外轮廓为流畅的弧线，细高柄，喇叭形圈足，柄上端有一周或二周凸棱。

罐 种类比较多，寺前出的一件，直口，圆肩，底部已残，可能为圈底，肩部有对称两个小耳。胎质较硬，肩部饰刻划叶脉纹，腹部饰菱形雷纹，纹样略有重迭杂乱。

鬲 数量不多，尚未见完整器。钱底巷出土一件残片，是鬲的肩部，宽陶索状耳，饰多行圆点纹，行间以弦纹分开。

刻槽盆 常用器类，十分流行。多为泥质灰陶，有深腹与浅腹之分。深腹者，敛口，斜收腹，底部不详，一侧有半圆形流，有的在流旁贴小圆饼两个；浅腹者，不带流，敛口或敛口窄沿，圆腹，圆底。刻槽盆的外壁装饰有绳纹、方格纹或梯格纹，内壁刻划多线菱形浅细槽。

器盖 比较流行的形制是杯口形捉手，盖身轮廓为弧线，寺前的一件盖身上饰一周刻划叶脉纹。另有一种比较精致的器盖，捉手部残缺，盖身作折线形，盖口较直，微内收。装饰比较复杂，盖口饰一周三角纹，盖面以四根扉棱等分，再饰圆圈纹、三角纹和凸起的小圆饼。

杯 不常见，郭新河的一件为夹砂红陶，质较硬，侈口，近直腹，杯底残缺，杯身一侧贴扁环形耳，下部饰绳纹。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后马桥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我们再接着分析它与马桥文化的演化渐进关系。

根据对马桥遗址第四层的陶片统计数据，马桥文化中夹砂红陶占25.9%，泥质灰陶占33%，泥质红褐陶最多，达41.1%。未单独统计硬陶，但是在泥质红褐陶中，因火候不同，可能还有胎料的区别，硬度差别较大，其中有一部分紫红与紫褐色陶，硬度已很高，无疑它们已经属于硬陶的范畴。这样看来，在陶系比率方面，后马桥文化与马桥文化的近似性占有主导地位。此外，二者的泥质灰陶一般采用轮制法成型，因此形态比较规整。

马桥文化的纹饰制法以拍印法与压印法为主。拍印法与后马桥文化相同，纹样常有重迭现象，这是因为拍印时，操作距离比较

大，难免出现这种现象。压印法的使用比后马桥文化普遍得多。因为是工具先与器身接触然后再压印，所以一般不会发生重迭。马桥文化的刻划不如后马桥文化发达，较少使用，纹饰种类也很少。

绳纹是马桥文化的常见纹饰之一，主要施于夹砂陶器上，陶鼎与陶甗上的绳纹，有竖行，也有斜行，纹样多比较纤细、清晰。而后马桥文化的绳纹比较粗，也不如马桥文化的清晰。马桥文化的拍印几何形纹饰，主要施于泥质红褐陶上，不见梯格纹、叶脉纹和方格纹比较多，其次是席纹、折线纹、雷纹和回纹等，基本上都是后马桥文化的常见纹饰。叶脉纹形态与后马桥文化很像，有通体拍印，也有将一个个单元叶脉纹压印在豆的圈足上，很有规律。后者在后马桥文化中尚未见到。席纹中，方形席纹，常常由四根短线组成，线条较粗；菱形或近菱形席纹，由六、七根比较细的线条组成，也与后马桥文化相似。折线纹，曲折的夹角大于90度。后马桥文化也有曲折纹。马桥文化云雷纹十分发达，拍印雷纹与后马桥文化相似，方角菱形，纹样重迭。但是另一种圆角近方形的云雷纹，纹样也有重迭，却不见于后马桥文化。这种纹饰在马桥文化中以压印法制作为主，很有特色，常常施于灰陶或带有红衣、黑衣的灰胎陶上，以圈足器为主，有豆、簋、尊，其它还有觚、盆等。压印纹与拍印纹不同，主要目的是美化陶器的外观。压印云雷纹富于变化，除圆角近方形者外，还有规整的菱形雷纹、活泼多变的各种卷云纹。它们多组成宽带围绕器身一、二周，少数多周。有的可以看出一排四个菱形雷纹组成一个压印单元。另外还有压印的鱼纹、鸟纹。这些压印纹样不见于后马桥文化。后马桥文化压印制纹法不发达，只流行圆圈纹和圆点纹，饰于簋、甗、器盖等器物之上。圆圈纹在马桥文化却不多见，目前只见于一件箕形器上。后马桥文化采用刻划法制出的叶脉纹、三角纹和堆贴的扉棱、凸圆饼，都是新出现的装饰，不见于马桥文化。

在陶器形态方面，马桥文化与后马桥文化联系密切的有甗、簋、豆，器盖、刻槽盆等，还有一些陶器附件，如鼎足、器耳等。

甗 马桥文化也流行甗 鼎合体的实足甗。口沿形制单调，只见宽折沿一种，远远不及后马桥文化多。沿下角大于90度，比后马

桥文化的沿下角大。束腰夹角略小于90度，呈明显内束状。后马桥文化的口沿多数比较窄，束腰夹角都大于100度。

簋 是马桥文化常用食器之一，多为泥质灰陶，口沿方唇下钩，沿下作凹槽状。腹部圆鼓内收，圈足一般都比较高，花纹多饰于圈足。从总的形态看，后马桥文化簋与之相似，但是细部不同，如口沿、器腹、纹饰等，后马桥文化的腹轮廓线微向内弧，花纹饰于腹部。

豆 马桥文化陶豆形制多样，有深盘与浅盘，粗柄与细柄之分。细柄豆可能与后马桥文化有渊源关系，细柄上压上下两周卷云纹，并以弦纹与镂孔作辅助装饰。后马桥文化的细柄装饰大为简化，只有凸棱。

器盖 马桥文化的器盖有好几种，以捉手的差异最显著。一种是伞头状捉手，流行年代较早，可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或早商时期，此类捉手到后马桥文化已经不复存在。另一种是杯口形捉手，作敞口状，捉手的外轮廓线或直，或微凸弧。后马桥文化的器盖捉手即从此演化而来，杯口形捉手为卷缘，外轮廓线微内弧。值得注意的是，捉手的演化在上海查山遗址已露端倪，该遗址所出器盖的捉手为卷缘，因有一周凸棱，所以轮廓线的凹弧不甚明显。查山出土陶器有瘦高体鸭形壶，因其形制接近福建黄土仑出土的陶壶，所以被看作马桥文化中比较晚的遗存。这样就可以勾勒出马桥、查山和后马桥文化三种杯口形捉手的演化轨迹了。

刻槽盆 现在还不太清楚马桥文化刻槽盆的完整形态。马桥遗址发表了一件残片，器内刻槽是多条平行线相交组成，纹样不规整，还有重迭现象。后马桥文化同样是多条平行线组成，但是菱形纹样很清晰，未见重迭。

马桥文化与后马桥文化的**鬲足**和**鼎足**都以剖面圆形和椭圆形为大宗。马桥文化的凹弧形鼎足很有特色，是向外的凹弧形，舌形体。浙江雀幕桥的凹弧足，触地部位平直。后马桥文化罕见此类鼎足，不见舌形体凹弧足，是不同于马桥文化之处。后马桥文化很流行的三足盘，罕见于马桥文化，亭林中层的一件复原三足盘，与后马桥文化差别很大。不过后马桥文化的三足盘足，椭圆形，一侧稍

微内凹，倒可能是马桥文化凹弧形足的孑遗。

马桥文化有宽扁形贴耳，将宽扁泥条环绕贴合后，再贴于器身上作耳，这种作风在后马桥文化中继续流行。

综上所述，后马桥文化与马桥文化在陶系、纹饰、器形等方面联系紧密，可以说演化轨迹是很清楚的。同时，马桥文化的某些因素在后马桥文化时衰退、甚至消失，后马桥文化出现了一些不见于马桥文化的新因素，这是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关于后马桥文化的绝对年代，上文的分析已经准确无误的显示，它与马桥文化的年代衔接，不存在缺环。马桥文化的下限，一般认为是商代晚期。查山中层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 3110 ± 120 年，可以作为马桥文化年代下限的参考值，它也应该看作是后马桥文化年代的上限。

我们还可以将后马桥文化的一些装饰手法比照中原地区的同样风格。后马桥文化的刻划三角纹在中原地区非常流行。安阳殷墟，这种纹饰出现于殷墟文化第三期，第四期更加盛行，三角纹刻在陶簋、陶鬲的腹部，多为一周，也有上下两周的。从刻划技法与排列上看，后马桥文化都与它们相似。到西周早期，河南洛阳、陕西长安等地仍然有这类纹饰，但已不如殷墟晚期盛行。此外，在江苏宁镇地区也发现了刻划三角纹，饰于簋腹，如断山墩遗址所出，年代为西周早期。鉴于后马桥文化与宁镇地区的三角纹都很少见，有理由认为这是中原文化因素影响下的产物。

西周早期，周文化的漆器出现圆形蚌泡装饰，贴嵌于漆豆之上，以至于同时期的陶器也模仿漆器，堆贴泡形小圆饼于豆、簋之上。距环太湖地区较近的苏、皖滁河流域，西周前期也有这种仿漆器装饰的陶器，江苏江浦蔺城子遗址的豆盘上，有的就贴附小圆饼。后马桥文化的陶簋与器盖上有这种装饰。此外后马桥文化比较流行的以弦纹间隔、多排平行排列的圆圈纹，亦见于陕西洋西张家坡的西周前期遗存。因此，后马桥文化的年代定在商末至西周早期比较恰当。

后马桥文化的分布区域与马桥文化相同，都在环太湖地区。太湖东北有常熟钱底巷，东部遗址较多，江苏境内有张墓村、郭新

河、越城遗址上层的~~去瓦~~梯格纹等也应属后马桥文化。上海境内有亭林、寺前、崧泽等遗址。后马桥文化的分布南界已越过钱塘江，目前仅知肖山蜀山遗址。长期以来，人们对后马桥文化了解不多，有的将此类遗存与马桥文化相混，有的又将其部分遗存与西周中期以后的遗存归并到一起。近年从钱底巷遗址和寺前遗址所获得的新鲜资料，无疑将有助于廓清这些迷雾。

以往我们曾对马桥文化所包括的文化因素及其来源作过分析，认为它的主要来源是良渚文化、浙南的“肩头弄期”文化、二里头文化、商代前期文化和岳石文化(7)。这些因素在后马桥文化中当然已经基本消失。后马桥文化包含的殷墟晚期文化和周文化因素，如前所述。后马桥文化还含有江苏宁镇地区湖熟文化的某些因素。首先是梯格纹，宁镇地区从商代开始一直流行到西周前期。马桥文化不见梯格纹，到后马桥文化竟成为泥质红陶一系的主要纹样之一。其次是羊角形把手，宁镇地区商末周初出现，西周比较流行，一般按于炊器鬲、鼎上(8)。后马桥文化也发现了按于~~甗~~鼎上的羊角形把手，但是并不普遍，此外还有刻槽盆，马桥文化少见，后马桥文化中数量实然大增，并有不同的种类。而宁镇地区早在商代就广泛使用刻槽盆。后马桥文化中这些因素的新出或盛行，当属湖熟文化对环太湖地区的影响渗透。

综上所述，后马桥文化分布在环太湖地区，与马桥文化大致相同。其主要文化面貌是马桥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晚期和西周早期，即公元前第二千纪末、第一千纪初。后马桥文化中含有中原商、周文化因素和宁镇地区湖熟文化因素。后马桥文化的确立，对探讨环太湖地区人文背景、自然环境的变化，具有直接的意义，也是研究吴文化形成及其区域性差异的基础。

注释:

- (1)曾昭燏、尹焕章:《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12期。
- (2)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1期。
- (3)a、蒋赞初:《关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几何印纹陶问题》,《文物集刊》第三辑。
b、宋建:《马桥文化探源》,《东南文化》1988年1期。
- (4)《马桥文化的源流》,《中国原始文化论集》。
- (5)黄宜佩、孙维昌:《上海地区几何印纹陶遗存的分期》,《文物集刊》第三辑。
- (6)载于《东南文化》1990年5期。
- (7)同(3)之b
- (8)邹厚本:《略论宁镇地区青铜文化序列》,《东南文化》1990年5期。

中国考古学会
第九次年会论文

论苏北淮海地区青莲岗文化的性质

燕 生 东

概要:苏北淮海地区的青莲岗文化(距今6600—6000年)既不同于鲁南地区的北辛文化,也不同于皖北地区的侯家寨一期文化,但又不是本区内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经过对其陶器、玉石器和农业经济形态的分析和比较,结合环境考古的成果,参考文化变迁的有关理论,可以看出本区内的青莲岗文化实际上是马家浜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主题词:青莲岗文化、北辛文化、侯家寨一期文化、马家浜文化、生态环境变迁、文化优势法则。

作者单位:山东枣庄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论苏北淮海地区青莲岗文化的性质

燕 生 东

苏北淮海地区是指通扬运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它位于淮海下游地区，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平原上黄泛冲积物分布广泛，东部有著名的里下河洼地，近海有盐碱地分布，平原北部是山东丘陵向南延续的侵蚀丘陵地区。在气候带上，秦岭—淮河是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和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苏北淮海地区恰处于其两侧，其植被特征大部分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极少部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的混交林。环境考古研究成果显示，苏北淮海地区的自然环境在不同时期有较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必然影响本地区的历史文化。

新石器时代，苏北淮海地区北部的山东地区存在着北辛文化(B. C. 5300—4300年)—大汶口文化(B. C. 4300—2500年)—山东龙山文化(B. C. 2500—1900年)系统，以南的长江三角洲存在着马家浜文化(B. C. 5100—4100年)—崧泽文化(B. C. 4100—3300年)—良渚文化(B. C. 3300—2200年)系统，以西的安徽中、东

部地区有侯家寨一期文化—古埂下层—古埂上层(约B. C. 5000—2000年)文化系统(1)。在不同阶段,三大文化系统在本区发展也不一样。对于距今6000——7000年左右的考古学文化,最早有人称之为青莲岗文化(2),并把其归入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系统内(3),近几年来,有学者把青莲岗文化分为北辛类型和大伊山类型(4),旨在把鲁南、苏北地区的北辛文化纳入青莲文化内,但又有学者指出北辛文化与青莲岗文化内有较大差别,北辛文化不包括青莲岗文化(5),最近,有学者把青莲岗文化分为侯家寨一期、双墩和青莲岗类型,力主把青莲岗文化的范围框架于苏北淮海、皖中、皖东和宁镇地区,使其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十分庞杂(6)。随着灌云大伊山(7)、沭阳万北遗址(8)的发掘以及对北辛文化、马家浜文化和侯家寨一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们重新认识青莲岗文化的性质提供了可能。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距今7000——6000年之间,苏北淮海地区存在着以淮安青莲岗遗址(9)和大伊山遗址早期遗存为代表的青莲岗文化、以连云港二涧村遗址(10)的早期遗存为代表的北辛文化和以万北遗址一期文化代表的侯家寨一期文化。这三种文化同时并存或有早晚关系,但并非是一个文化体系。本文从陶器、玉石